

大市通衢传承至今



1994年,大市口商业城工地考古现场。

□ 马彦如 张剑

商业中心是城市化达到一定高度的产物,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经济、商业发展水平。镇江的商业中心大市口,旧称“大市”。远在千年之前,这里即是“车马四来,阡陌大壮”的繁华市街,延续至今仍然是名城的商业中心,这在我国城市史上堪称奇迹。

唐代润州城市的市政设施,文献语焉不详,但考古发现的成果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唐代润州城市的风貌。

1912年,镇江“创筑马路”,在市心出土北宋崇宁年间修街砖记;1931年,修筑市心路时又发现北宋初年“砌大市砖街”石碑两方;1984—1996年的十余年间,考古工作者多次配合大市口各项建设进行考古勘探、发掘,所有出土的文物、遗迹,林林总总,展现出一幅大市文化的历史画卷。

大市的历史,应可上溯到唐代。1984年考古工作者曾在中山路拓宽工程地下,发现唐代木构下水道,在穿过大市中心时呈“十”字形分布,上面铺设木板,供行人、车辆行走,这条下水道大致勾勒出唐代大市的街衢格局。

唐代城市内,民居和市是分开的。民居为坊,每坊四周设墙,有门进出;市,也有一定的范围,定时开启、交易。古代管理市的官为“市令”。《新唐书·路隋传》记述了唐代路隋曾任润州“知市事”(即代理市令一职)的故事。路隋原担任润州参军,性格刚直不阿,被当时的贪吏——润州刺史李筠“欲困辱之,使知市事。”路隋怡然自得坐在市中,既不介意,也不以为屈。路隋当年所坐“市中”的地方,即今天的大市口。后来,路隋官至镇海军节度使,从市场管理负责人跃居润州最高军事长官,成为镇江历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在1994年

大市口西北角镇江商业城建设工地考古探方的唐代地层里,发现一处房基内有多口灶坑遗迹。灶坑平面基本呈圆形,用砖块砌成口大底小形状。灶台口径1.1米,深约0.7米,一侧并设台阶式烟道,火膛内壁为红烧土,还残留着草木灰烬。另在灶坑近旁,还发现一处唐代灰坑,坑内出有数十件青釉和酱釉瓷碗,大多为敞口斜腹平底碗,碗底外突出的一圈烧制支钉尚存。这批同一型式并且多未经使用的粗制大碗,似为业主经营所用。结合以上诸种迹象,这一唐代房基约是大市范围内的手工业作坊遗址。

1985年中山路拓宽工程的大市口段,以及大市口西南侧的华联大厦建设工地,亦曾出土唐代的铜九曲杯、船式银铤、石人像、炼金属的小坩埚以及大批精美的唐代青瓷及彩瓷器皿,如越窑瓷执壶、长沙窑鸟荷三足盆、双系彩瓷罐、壶、水盂、多足砚、瓷碗、茶碾等,还发现多处水井及灶台、烧坑遗迹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大市曾经的繁荣景象。

在中国古代,各朝各代对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和管理都十分重视。润州城市的街衢及坊市分布,未见志载,但近年内考古发现的唐代下水道遗迹,为探索城市的格局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

唐代木构下水道遗迹,在市区地下曾多次发现。1985年中山路拓宽工程,从大市口到中山桥一线开挖宽4米、深4米、长700余米的长沟埋设现代下水管道,在这一工程沟内深4米处的唐代地层,考古工作者不时发现自东向西的木构下水道遗迹。这些木构下水道,两壁间设桩固定木板,上口略大,口宽0.9米,深约0.8米,与现代中山路的走向几乎一致,同时,在中山路一线如牌坊巷口、山门口街口等处,还发现了下水道的支道通向街、巷之内,说明这些街巷的历史十分悠久,远在唐代就已存在,其方向与中山路垂直,表明当时的街道、坊市是依方形规划设置的。

此外,1992年拓宽解放路南段工程以及1993年拓宽解放路北段工程,都陆续发现唐代木构下水道遗迹。前者是从大市口向南延伸,后者是从大市口向北延伸。在四牌楼路口,还发现有支道从古绿水桥畔通向古青苔寺等方向。下水道的构造与中山路所见相同,大小尺寸也相似,北侧为黄土堆积的路埂,南侧傍临古镇江“关河”的坡岸地层,叠压淤土,并见有以木桩护岸的迹象。

“青苔寺里无马迹,绿水桥边多酒楼”,唐代诗人杜牧正是徘徊在这条支道上吟唱出镇江的城市市井风情。



1984年,中山路拓宽工程大市口段施工沟内,发现唐代木构下水道遗迹。

《问道茅山三千年》③

□ 张春蕾 夏和生



茅山道教历史沿革之秦汉时期

在北方全真教兴起以前,茅山是全国道教的活动中心,研究中国道教必先研究茅山道教开始。我们按秦汉时期,魏晋南北朝时期,隋唐北宋时期,南宋金元时期,明清时期及近现代时期这六个板块来勾勒茅山道教的历史脉络。

秦汉时期(公元前221—公元220年)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,历史跨度400多年,这一时期是茅山道教的萌芽时期,当地原有的鬼神崇拜与北方南下的五斗米道、太平道相融合,为茅山成为道教圣地奠定了基础。

据《茅山志》《句容县志》以及道教史料记载,早在上古帝喾高辛氏时代,中原人展上公就迁居到句曲山伏龙山溪上(今句容市茅山镇玉晨村)居住修炼,在玉晨观前的石碑坊上刻有“高辛道场”的字样。这是文献资料对茅山道教历史的最早记录。周朝时燕国人郭四朝也曾曾在玉晨观修炼得道,并被敕封为“太微葆光真人”。秦汉时的李明真人是史料中第三个被提到的来句曲山修行的仙人,在当时的句曲山古炼丹书院(即今天的茅山乾元观)修炼,至今尚有丹井留存。

西汉年间,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来到句曲山,在山下(今下泊官村)修真养性,行善济民。宋时周必大在其《游茅山道中口占》一诗中写道:“千峰溧阳来,势若西南奔。遥拱三茅峰,不敢迫至尊。三茅如轩悬,次序俨弟昆。”

茅盈、茅固与茅衷是三兄弟,他们的高祖茅濛曾于西岳华山修炼,是鬼谷子的徒弟,《史记》有详细记载。当时流传着一首童谣:“神仙得者茅初成,驾龙上天升太清。时下玄洲对赤城,继世而往在我盈。帝若学之腊嘉平。”表明茅濛已经预言自己的玄孙茅盈将要继自己之后得道成就。但秦始皇嬴政却以为歌谣中的“盈”是指自己(赢),于是把腊月改名为“嘉平月”,并派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去海上寻找仙药。他们的父亲茅祚居陕西咸阳,从事农桑。最早来茅山修行的是长兄茅盈,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(公元前145年),富有才学,但对从政没有丝毫兴趣,却热衷于采药炼丹、修真养性。18岁入恒山学道,遍访名师,专心修炼,并游历了很多名山大川,道行(héng)大进。汉昭帝始

元五年(公元前82年),时年63岁的茅盈来到句曲山下(今句容茅山下泊官)结庐修道,经久不回家。二弟茅固、三弟茅衷原在当地做官,听说长兄修行有成,于是结伴到江东句曲山寻兄,受长兄启发,决定一同修道。三兄弟分别居于句曲山的三座主要山峰精进学道,采药炼丹,济世救民,终于悟得真谛,得道成仙。

道教许多人物慕名而来,以茅山为道场,在这里造房建屋、采药炼丹、著书立说,甚至开宗立派。茅山道院开启了道教建宫观寺院的先河,从此以后,道教也像佛教一样,选择风景秀丽的名山大川作为道教的活动场所。宋代蔡卞在《赠华阳法师》一诗中说:“师道华阳洞,山花几度开。祇应常救物,却遣世人来。”

道教界特别是茅山道教与道士对三茅兄弟顶礼膜拜。上清第二、第三代宗师杨羲与许谧在茅山创立道教上清派时,都推茅氏兄弟为上清派祖师。南朝齐梁著名道士、第九代宗师陶弘景创立道教茅山宗时,也尊三茅兄弟为该派祖师。由此可见,三茅兄弟是茅山道派中公认的祖师。直到今天,茅山道士除学习道教共同经典外,还要念唱《三茅词》《三茅宝忏》及《三茅表》等经文。除茅山“三官五观”塑有三茅兄弟神像外,大江南北为纪念三茅兄弟而建的三茅宫难以计数,充分说明三茅兄弟在道教界的地位与分量。

茅山老百姓为纪念三茅兄弟,在句曲山下建三茅真人庙(时称“白鹤庙”),后来还将句曲山更名为“茅山”,并将他们生前居住的三座山峰分别称作大茅峰、二茅峰和三茅峰。元代茅山道士刘大彬编修的《茅山志》中记载着民间歌谣:“茅山连金陵,江湖据下流;三神乘白鹤,各治一山头;召雨灌旱稻,陆田亦复柔;妻子咸保室,使我百无忧;白鹤翔青天,何时复来游?”明代文人夏言《游茅山漫句》中写道:“采药还寻福地,入山先礼茅君。千径花零红雨,一峰犬吠白云”。

东汉末年,山东和四川先后出现了巨鹿(今河北巨鹿县)人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和沛国(今江苏沛县)人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。随着东汉帝国的崩溃,北方各阶层不少人士都逃到相对安定的长江以南来避难,其中包含许多高道名士。

山东琅邪道士于吉来了,汉末安徽庐江著名方士左慈也来了。左慈曾被曹操招至门下,从魏国逃到东吴后,就来到了江东茅山。他把丹经传给了家住茅山脚下的丹阳郡句容东吴贵族葛玄(164—244年),葛玄传给郑隐,郑隐后来又传给了葛玄的从孙葛洪。左慈等高道名士的到来,茅山进一步成为江东道教的名山胜地。